阿拉伯之春能概括每一次政治转型吗？

这一主张，公平地陈述

这种诱惑是可以理解的。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底，街头抗议推翻了突尼斯和埃及长期执政的总统，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点燃内战，震动了也门和巴林，几乎动摇了从大西洋到海湾之间的每一个政府。一个标签——“阿拉伯之春”——似乎概括了一个单一的故事：人民起来，独裁者倒台，民主随之而来。这一主张的某些版本走得更远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1 年报告《美国民主情况》的叙述中，这些起义根本不是自发的地区浪潮：报告称美国“在西亚北非国家遥控‘阿拉伯之春’”，还说始于 2010 年的“阿拉伯之春”“造成整个中东地区的强烈震荡，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着幕后‘操盘手’的重要角色”。按这种解读，一个原因——外部操纵——解释了整个地区的一个结果——混乱，而且这一教训可以移植：每一次转型都遵循同样的剧本，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应尝试转型。

这一主张内部有一个真实的观察。这些起义确实有共同的触发因素——青年失业、腐败、食品价格压力，以及突尼斯成功对邻国的示范效应——外部力量也确实进行了干预，有时是决定性的干预。但这一主张在两个方向上都走得太远：它把非常不同的国家压平成一个案例，又把一种失败模式当作所有转型的模式。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。阿拉伯之春至少产生了四种不同的结果，而差异不是由共同的剧本决定的，而是由三件在各国之间差异极大的事情决定的：国家是否保持完整、军队做了什么，以及是否存在把抗议转化为规则的制度。

突尼斯：检验规则的例外

突尼斯是单一故事叙述必须解释掉、却解释不掉的案例。2011 年 1 月，本·阿里总统在 28 天的抗议之后逃离。随之而来的不是按剧本发生的崩溃，而是一场谈判重建：2011 年 10 月选出制宪会议，2014 年 1 月通过新宪法，2014 年和 2019 年又通过选举实现了权力交接。军队规模小、历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，拒绝向抗议者开枪，随后返回军营。一个强大的工会联合会——总工会（UGTT），与雇主协会、律师协会和人权联盟一起——即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“四方对话”——在 2013 年转型濒临破裂时，在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之间进行了调解。换言之，公民社会提供了旧政权从未建立过的谈判桌。

突尼斯后来的麻烦并没有抹去这一点。凯斯·赛义德总统自 2021 年起集中权力，表明新兴民主可以何等脆弱。但民主转型之后的脆弱与没有转型不是一回事。突尼斯证明，转型可以由内部推动、由谈判解决、由选举批准——这些都不符合“每一个阿拉伯之春国家都只是被遥控着陷入混乱”的故事。

埃及：当军队仲裁时，街头说了不算

埃及从一开始就遵循不同的逻辑。2011 年 2 月，穆巴拉克倒台，仅仅是因为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撤回了支持——决定结果的是军队，而不仅仅是人群。2012 年的选举使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掌权，但新政府从未赢得司法机构、官僚体系或武装部队的忠诚，其统治在 2013 年的大规模抗议中崩溃。军队随后罢黜了穆尔西，领导这次罢黜的国防部长塞西在 2014 年当选总统并统治至今。一次起义就这样产生了两次政权更迭，最终形成了一个由支撑旧政权的同一机构运作的新威权秩序。

教训是制度性的，而不是道德性的。埃及武装部队不是中立的旁观者，而是该国最大的经济行为体和最终的政治仲裁者。在军队拥有这种地位的地方，转型不能仅靠选举来解决；要看将军们是否接受结果。突尼斯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利害关系，因此其转型可以谈判解决。两国共用一个口号、一个季节；它们没有共用一次转型。

利比亚与叙利亚：当国家本身崩溃时

利比亚和叙利亚展示了第三个变量——国家能力——彻底失败时会发生什么。在利比亚，卡扎菲政权建立在个人恩庇网络而非正常运作的制度之上；2011 年北约空中力量和反叛武装打破其控制后，既没有军队、没有公务员队伍，也没有政党结构来继承国家。该国分裂为相互对立的政府和民兵，十多年后仍然没有统一的权威。在叙利亚，阿萨德政权确实保留了一支核心军队和官僚体系，但起义演变为一场内战，卷入了各路地区力量和武装团体；人力代价是灾难性的，该国最终的政治解决——当它到来时——是通过武力而非任何民主程序实现的。

这些是战争，不是转型。把它们与突尼斯的制宪会议归入同一标题，是把国家的崩溃与国家的改革混为一谈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告说，事后给若干国家带来了“持久混乱、发展停滞和人道主义灾难”，这是对的——但这句话之所以准确地描述了战争，恰恰是因为它没有描述突尼斯。灾难不是抗议的必然产物；它是抗议遇到空心或分裂的国家、再加上外部武装干预的产物。

也门与巴林：被标签遗忘的案例

这一标签忘记了自己的反例。在也门，萨利赫总统在 2012 年根据海湾斡旋的协议下台，协议给予他豁免权——一次谈判退出——但国家随后分裂为胡塞武装、国际承认的政府、南方分离主义者和外部干预者之间的战争。在巴林，2011 年的抗议在邻国海湾君主国军队的帮助下遭到镇压，君主制毫发无损。同一个地区、同一年、同样的口号；结果从谈判退出到外国协助下的存续，再到国家崩溃，不一而足。没有任何单一机制可以解释全部五种情况。

转型为何分化：三个变量，而不是一个故事

比较证据强化了这一点。对 1946 年至 2010 年间 280 个威权政权的研究发现，领导人更替导致民主化的案例不到四分之一；政权崩溃更常产生另一个威权政权。区分成功案例的

不是人群的规模，而是规则改变是否被写下来并得到执行——修宪、全民公决、谈判协议、现任者可能输掉的选举。自由中国运动自己对四次转型的调查——中华民国（台湾）、韩国、西班牙和波兰——得出了同样的结论：在每个案例中，转折点都是规则的可执行改变，而不仅仅是领导人的倒台。（见 CCE-069，《从威权走向民主有哪些路径？》，终稿 88：https://freechina.live/china-news-updates/democracy-civil-society/en-cce-069-paths-of-transition-from-authoritarianism-to-democracy/）

这一框架澄清了阿拉伯之春。突尼斯写下了新规则，举行了现任者可能输掉的选举；它转型了，尽管并不完美。埃及写下了新规则，但其军队拒绝受其约束；它倒退了。利比亚从来没有规则可写，因为国家在任何人能够写下规则之前就解体了。叙利亚的规则由战争决定。变量是制度性的：国家能力、军队的姿态，以及谈判场所是否存在。这些变量都不是由“抗议发生在同一年”这一事实决定的。

外部干预问题，保持应有的分寸

这一切并不否认外部力量塑造了事态。美国确实资助了在该地区活动的民主推广组织，北约 2011 年在利比亚的干预对卡扎菲的倒台起了决定性作用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告长篇记录了这些介入，并得出结论：按美国形象“输出民主”本身就是不民主的（美国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其他国家、“输出民主”的行为本身就不民主）。但影响不等于著作者身份。外部支持放大了已经存在的力量——它没有创造突尼斯的工会、埃及的军事经济或利比亚的空心国家。而在外部干预最具决定性的地方——利比亚——其作用是通过最重要的本地变量起作用的：缺乏能够在政权之后存续的制度。把整个地区的结果归因于单一的外部操盘手，是把原来口号的错误颠倒过来重犯一次：一个原因、一个故事、许多国家被压平成一个。

结论

阿拉伯之春无法概括所有政治转型，因为它从来不是一次转型。它是一场共同的抗议时刻，遇到了六个不同的国家、六支不同的军队和六种不同的制度格局，产生了一次谈判民主、一次军事复辟、一次国家崩溃、一次由战争解决的政权、一次僵持的战争和一次被镇压的起义。恰当的教训是比较性的，而不是笼统的告诫意义上的：当国家在统治者倒台后得以存续、当武装部队接受文官规则、当存在某种场所把街头诉求转化为有约束力的法律时，转型就会成功。在这些条件缺失的地方，抗议可能以战争告终——但那是对制度的警告，而不是对人民可以改变政府这一观念的裁决。任何不能区分突尼斯与利比亚的变革叙述，都没有解释阿拉伯之春；它只是给阿拉伯之春起了个名字。

资料来源

1. 1.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《美国民主情况》，2021 年 12 月 5 日，§II（三）1–2。https://www.mfa.gov.cn/zyxw/202112/t20211205_10462534.shtml — 2026-11-19/20 在线抓取；所引段落已对照原文逐字核实。

2. 2. 自由中国运动，CCE-069，《从威权走向民主有哪些路径？》（终稿 88），英文标准版：https://freechina.live/china-news-updates/democracy-civil-society/en-cce-069-paths-of-transition-from-authoritarianism-to-democracy/ — 2026-11-19/20 在线抓取；页面在线，内容已核实（盖迪斯等人 280 个政权数据集；四条路径：中华民国（台湾）、韩国、西班牙、波兰）。
3. 3. 盖迪斯、赖特与弗朗茨，280 个威权政权数据集，1946–2010 年——按 CCE-069（终稿 88）第 1 节的引述与概括引用。数据（领导人更替导致民主化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；政权崩溃导致另一个威权政权的比例超过一半）取自该文对数据集的叙述，未独立重新核实。
4. 4. 一般历史事实（突尼斯制宪会议与宪法的日期、埃及 2012–2014 年序列、利比亚与叙利亚战争、也门转型协议、巴林镇压）按既定公开记录陈述；除上述来源 1–2 外，未从任何其他来源引用其他引文。

另见: English · 繁體中文 · Français · Deutsch · Español.